

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基欧汉、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任晓： 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太过美国化



一战之后，国际关系学开始逐步脱离历史学和法学，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其中的政治现实主义成型于英国名家 E.H. 卡尔 (E.H. Carr, 1892—1982) 对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批判，两方对于如何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灾难，有截然不同的主张。在德裔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1904—1980) 之后，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主导理论。行为主义运动则使这一领域在美国变得高度科学化。

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的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1941—) 以《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4) 等著作闻名于国际关系学界。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张正是基于对肯尼思·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认为沃尔兹“未能充分关注跨国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导致对世界政治的理解有所缺失。基欧汉相信，国际制度一旦获得建立，会自主自在，影响国家行为。他注重

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内因素的互动联系，由此发展出“合作”“复合相互依赖”等概念，进入“全球治理”等议题。

5月下旬，基欧汉教授受邀来到复旦大学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发表“霸权之后：制度化合作与世界政治权力转移”的讲演。藉此，《文汇报》特邀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与基欧汉教授就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证主义以及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等议题进行对话。

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就世界体系给出理解框架

任晓：我想请您谈谈您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状况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界缺乏大理论，缺乏大胆的观点和勇敢的思考——他们觉得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的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知您的感觉、印象如何？

基欧汉：过去20年来，我们确实没有产生大理论。但要说全都在讨论细节，也有例外。米夏埃尔·齐恩 (Michael Zürn, 供职于柏林社会科学中心) 对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的观察，就是建立在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制度遭遇了合法性的困扰，但一直以来，它们承担了很多治理 (governance) 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也是一个十分偏向以制度为中心的观点，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更偏向制度。他给予了这些国际制度以更大的重要性，也给它们更大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盟——作为既有的存在的欧盟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制度主义”的一个发展。

英国学派也讨论大问题，他们以国际社会为研究主题，但对我来说，英国学派更程

度上是一种历史体系，我并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重大的理论进展。欧洲的大政治理论家，属于一个不同的世代了，像卡尔这一辈。

任晓：一般都认为卡尔是现实主义理论家，但他的思想是丰富的，其代表作《二十年危机》中有一章是写“现实主义的局限性”。当今的现实主义则不断固化自己的立场，自我封闭起来，有的甚至推向极端，比如米尔夏默 (John Mearsheimer) 的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简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极其静态，这种理论会束缚人的思想，看不到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您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何看法？

基欧汉：我想现实主义现在还是生机勃勃的，虽然他们很长时间都没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了。他们现在显得非常地雄辩，甚至还有一些决定论的感觉，说一个国家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或者什么事件不可避免。这些观点非常有市场，尤其是当前的美国外交政策越来越往“美国第一”的方向发展，更是给现实主义添砖加瓦。另外，中国的崛起也是一种助推。所以你会听到有很多人，现在有个“修昔底德陷阱”，但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理解方式。

实际上，现实主义现在是被复兴了，要知道近在1990年代，它还处于守势，需要自卫呢。因为那时候，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国际合作正

在不断增长的十年，那时候，国际和平似乎是一个主导趋势，虽然也有南斯拉夫解体、冲突这样当时认为是例外的情况。但现在，我们似乎重又在 大国冲突中感受到了真正的威胁。当前这个时代，“软实力”这个概念也不像20年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说现实主义里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还是在沿着老路走。

我倒是很想知道，在中国这边，是否有新的理论进展？

任晓：关于国际关系的中国学派建设，现在我们这边确实有一些进展。有一本包含了不同观点的英文文集《建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Routledge, 2015)，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中包含了不同观点的论辩。最新的重要进展是秦亚青教授的新著《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8)，以及阎学通教授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个词听起来似乎矛盾，但他的确试图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营养，新书明年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三是我们上海的一些社会学、哲学和国际关系学者试着提出和发展的“共生理论”(symbiotic theory)，包括我本人在内。这是在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努力方面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进展。

基欧汉：我很高兴听到有这样的进展。因为，显然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一个大国，我们

需要一个中国学派。任何一个大国都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就世界体系给出一个结构、一个框架，使得本国的人们能够理解世界体系。

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实主义是乔治·凯南 (George F. Kennan, 1904—2005) 在冷战时期提供给美国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框架，而制度主义是给1970年代的政府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框架，但是它尤其为后来的克林顿政府所吸收。这届政府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都认同一种大体为制度主义的看法。所以我想中国的领导人会需要一个，或许不止一个，理解世界的宏观视角。

我想知道您提到的这三种中国的研究进路中，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又各自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汲取了哪些特别的元素？

我这么问是因为，像制度主义的理论，实际上是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文化，根植于自由主义的。制度主义是非常美国化的一种理论。齐恩的作品则是非常欧洲化的，因为他对于欧盟采取了一种非常看重的立场，而在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欧盟很可能并不会具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任晓：我想我们的一条共同线索都是在主张一种由中国人建立起来的理论。“中国学派”这么一个词通常会被误解为是民族主义的，人们会很怀疑说这些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实际上我们想要说的只是，这些理论是由中国本土的

国际关系学者创造性地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的视角、关怀和思想底色，或者是在中国哲学、历史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转化发展而来，而非舶来的。“中国学派”的涵义不过如此，但确立的标杆还是比较高的，需要作出自主的、脚踏实地的努力。对“中国学派”一语的误解，希望能够逐渐消除。

秦亚青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relationality)，也就是用这个概念来看待和处理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他还有一个概念，“过程”。这是他的两个核心概念。

阎学通发现道义在中国思想里是如此重要，同时，他又自认为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试图结合两者，于是称之为“道义现实主义”。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也许是矛盾的，因为“现实主义”是强调权力、利益的。

我则编辑了一本文集《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2015)。我们也是基于中国的思想传统，相信自然界与社会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是，或可以是，共生的。它们不仅仅是共存，而是超越于其上，相互激发、相互补益，形成一种生生不息的状态，谓之共生。

基欧汉：我理解，在中国，“关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人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原子式的个体，而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你会把自己看作是某个地方或某个家族的一分子，这和美国的个人主义大不相同。而这对于